



# 镇里最后一名民办教师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徐成文

学大门,我才知道还有一种语言叫普通话。我没有接受过普通话教学,很多的生字只能标注“别字”。好在语文老师愿意从零开始为我补课,我才掌握了拼音的有关知识。回到家,我把所学的拼音知识教给父亲,希望他在以后的教学中尽可能给学生传授拼音。

现在很多师范院校都开设了小学全科教师专业,目的是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当全科老师。而几十年前的民办教师,又何尝不是全科教师?父亲是村里唯一的教师,他长期教着两个年级。一间教室,左边是低年级,右边是高年级。父亲一会儿教低年级的语文,一会儿教高年级的数学。低年级授课时,高年级的学生就完成作业,反之亦然。两个年级因只有父亲一人教学,除了语文、数学课程外,其他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自然课则统一授课。长大后,我读了师范,方知父亲那时所采用的是复式教学。

我们村里面积不大,但山高地陡。学生要是中午回家吃饭,往返需要花费不少时间。父亲决定让家远的学生带粮食到学校,中午统一蒸饭。学校没有食堂,父亲就把我们家的厨房当作学生的食堂。中午时分,他便系上围裙,时而切菜时而添柴。不一会,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便摆在桌上。时间一长,母亲抱怨声起,学生不带柴不带菜,我们家总不能一直倒贴吧。一向打马虎眼的父亲,任凭母亲唠叨满地。后来,家长们也觉得亏欠了父亲,于是送粮送油送柴。

每学期开学的日子,父亲总是叫上几个力气大的学生,跟着

他到镇里的中心小学领取书本。领取完毕,他会掏钱给学生买几颗水果糖或者一个馒头。镇里距离村小有十公里小路,父亲总是带着学生徒步前行。要是路上遇到下乡的卖货郎,父亲会毫不吝啬地给学生买个梳子、镜子、橡皮擦等小玩意,以哄学生开心。有家长提议,说是每学期老师从镇里背回书本很辛苦,建议书本费多收一毛两毛,但被父亲拒绝了。他觉得为学生干点实事,是理所当然的。

父亲的身份虽是民办教师,但他的工作态度不亚于公办教师。虽然农活会耽误他一些教学时间,但他从不把学生的未来任意践踏。白天劳作了一天的父亲,夜晚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半夜,为学生批改作业,为第二天的上课精心备课。镇里有十五个民办教学点,父亲所教的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父亲有自己的教育理念——庄稼不好误一季,学生不好误一生。

作为民办教师的父亲,影响着我们的后代。在我们抉择人生职业时,我和大哥毅然决然报考了师范院校,做起了人民教师。看到孩子继承了他的衣钵,已经不再做民办教师的父亲很是欣慰。好在我大哥是正规的公办教师,不再像父亲那样一边牵着牛绳,一边手握粉笔那样辛苦。

用背带把大姐背在背上。在父亲颠簸的背上,大姐也能酣然入梦。几年后,我也沿着大哥大姐的足迹,成了父亲班上的一名学生。

民办教师身份特殊,他们介于农民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。他们的户籍、口粮均在农村,但每月又能拿到低微的工资(土地承包后就有了工资)。我家人口众多,家里唯有母亲一人全天候劳动。农村地广田远,那些笨重的农活是一个瘦弱的女性无法完成的。每逢农闲时节,父亲便调整学校的作息时间,要求学生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校,中午不休息,连着上课,下午提前两小时放学。放学后,他立马赶到自家的田地里,干那些母亲无法完成的农活。一次,上课铃敲响,父亲还没有出现在教室,不一会儿,父亲喘着粗气跑到教室,为了抢时间,居然还卷着裤管,犁田的稀泥巴还糊在双腿上。

民办教师没有经过专门的师范院校培训,算是半路出家。他们的教学经验是在实践摸索中获取的。我的小学是在村里学校完成的。由于民办教师多不识拼音,自然他们无法教给学生拼音,课堂里始终飘荡着四川话。踏进中

父亲是我们镇里最后一名民办教师。那年上级红头文件下来,按照规定,父亲不具备转正资格。镇里领导说,我们村里缺教师,就让父亲再干一年,新教师来了再说。

严格说,我们家四兄妹都是父亲的学生。五岁的大哥,自幼聪明伶俐,年纪尚小的他,还没到法定读书年龄,便每天缠着父亲,叫嚷着去学校读书。

父亲是村里文化最高的,自然被公社安排做了民办教师。父亲没有工资,他的报酬是每天8分的工分。父亲手里抱着五岁的大哥,背上背着嗷嗷待哺的大姐,一步一步朝村里的学校走去。到了学校,父亲把大哥安排在教室最前一排,一是为了照顾,二是防止他调皮捣蛋。当时年仅半岁的大姐,似乎很会体谅父亲的难处,只要出门时母亲喂饱了奶水,她就可以安静地躺在教室后面用课桌铺就的“小床”上。但更多时候,饿极了的大姐便会在父亲津津有味的讲课中突然嚎啕大哭,惹得学生一片哄笑。为了教学能按部就班,父亲只好

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……”每次我们小学早晨的升旗仪式上,老校长总要用他那洪亮的嗓音给我们描述共产主义实现后的情形,鼓励我们勤奋学习,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,早日实现那美好的愿景。在我印象里,那时刻总是天气晴朗,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,我站在队列中,热血沸腾,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老校长姓郭,脸方耳阔,头顶灰色的短发向上耸立着,春秋时节他常穿一件浅灰色旧中山装,左胸口袋里别着一支黑钢笔,笔夹在光线的映照下金光闪闪。

彼时,中心校是乡镇层面的教育管理机构,隶属于县教育局,负责管理辖区内所有初中、小学。我们乡只有一所初中,也是中心校的驻地。中心校的领导们时不时会到各村小学检查工作。为了迎检,老校长每次都会发动全体师生进行卫生大扫除。他会提前给每个班主任分配任务,做好部署。迎检当天一大早,学生们从家里带来打扫卫生的工具——扫帚、铁锹、铁桶、洗脸盆、抹布等等——来到学校的大院里集合。老校长一声令下,我们按照各自的分工忙碌起来,他双手背在腰际,在校园里来回踱步,鼓励和督促大家。我们把教室的每块玻璃擦得锃亮,把每张桌子都抹得干干净净,把地

面扫得清清爽爽。最后,开始打扫大院,几十个学生用扫帚把地面划拉一遍,把垃圾聚拢起来,再用铁锹装到铁桶里提出去,随后大家端着洗脸盆到处洒水,令地面湿润无尘……

有一次中心校校长亲自来检查,老校长极为重视,他动员师生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,对卫生扫除提出更高的要求——除了打扫教室和院落,连厕所也要清理。打扫厕所这个艰巨的任务分配给了我们五年级的学生。班长带我们男生打扫男厕所,我是副班长,干得最为起劲。厕所清理结束,面貌一新,可见老校长的感召力多么强大。

老校长很喜爱自己的学生,希望他们中间能出几个栋梁之材,为村争光,为国效力。当时乡村教育资源极为匮乏,农民观念落后,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很低,一些学生小学毕业就不再读书,大部分学生初中读个一两年就辍学了,极少部分学生坚持到毕业,能考上高中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。

当年的乡中没有宿舍,学生们每天都要走读。他们父母多为文盲,不能辅导他们的功课。为了这些所剩无几的苗子,老校长在小学里提供一间教室供他们自习,他义务辅导他们。当年的电力不足,农村断电是常有的事,学生们都备着蜡烛,一停电,漆黑的教室里就会燃起点点火苗,映照着学生们聚精会神的脸庞。有一次村里停电,我跑到学校里玩耍,看见那间教室里烛光氤氲,

便进去参观,看见那些大哥哥姐姐们有的在做题,有的在写作文,有的在画画,郭老师坐在讲台上欣慰地看着他们。

老校长关注学生们的综合发展,对那些“不务正业”、有突出特长的学生也特别重视。我读小学时喜欢画画,在村里很有名气,老校长特别喜欢我,每次见到我的父母,都嘱咐他们一定要把我培养好,将来做个大画家。那时,中心校每年都要组织美术比赛,他总会鼓励我参加。赛前,他为我买好画笔、画纸和颜料,带上美术老师到我家,让我在课堂的桌子上自由创作,他们在一边指导。

我读五年级那年初春,在中心校组织的绘画大赛中拿了一等奖,中心校还邀请我到乡中现场表演作画。

那天一大早,老校长亲自骑着黑色的凤凰牌自行车驮着我向乡中进发。那时的乡村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。他一边用力蹬着脚踏,一边和我愉快地聊天,嘱咐我不要紧张,到了现场要好好表现。记得那天天气晴朗,但刮着冷飕飕的清风,我双手挽着他的腰,被冻得鼻涕直流。

我们颠簸了一个小时,终于到了乡中,等我们进入作品展览室,里面已经站满了人,中心校校长被围在中间。他个子高高,留着背头,戴着一副黑方框茶色眼镜,表情严肃,但见了老校长和我,马上露出和蔼的笑容,对我说:“小画家来了,快来让我看看你的绘画技术。”老校长领着我走到展室中央的长桌前,信心满满地说:“张校长,你出题吧,你让他

画什么他就能画什么。”

张校长看了一眼老校长,将信将疑,他转了转眼球,低头对我说:“你给我画一个《水浒传》里的人物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,一边吸溜鼻涕,一边刷刷几下画出一个行者武松,他手持双刀,威风凛凛。张校长带头鼓掌,展室里一片喝彩之声……

老校长刚退休不久就去世了,我一直记得他给我们描述的共产主义景象: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……

如今,我们国家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村很多人进城住进了楼房,留在村里的也住在崭新宽敞的庭院里,有的还自建了漂亮的别墅,现在正在规划建设小区;村里人家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气,中青年家庭基本上每户一辆家用轿车,用上人工智能管家,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;村里几乎每个人,包括老年人,都有一部智能手机;村里村外的大路小路都硬化了,人们还可以乘坐高铁,日行千里,到祖国的任何地方;网上购物也普及到村里,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;我们的能源也实现了多元化,包括风能、光能、水能、核能,电力充足,再也不会出现夜晚点蜡烛或油灯的景象了……只可惜,老校长未能看到这些景象。

我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盼,虽然没当成画家,但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,守护人民的安宁,为国家出力。如今的我,每想到老校长,就会坚信,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。

# 左胸口袋别着黑钢笔的郭校长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宋士涛

